

罗蕙锡与凌淑华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

朴银淑,危立君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罗蕙锡和凌淑华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韩中两国颇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及画家。她们通过小说表现了对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制度的批判,对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追求,对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等共同的女性意识。但罗蕙锡着重从启蒙性质的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暴露女性受到的社会压迫,而凌淑华则从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出发,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女性生活以及她们的病态和渴求。在创作手法上,她们分别以中国传统绘画的余白之美和写意手法及西方绘画中的光线和色彩搭配描绘环境和背景,使作品审美价值倍增。

关键词:罗蕙锡;凌淑华;小说;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绘画手法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13)06-0051-06

收稿日期:2013-09-24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3YZA752016)

作者简介:朴银淑(1968—),女,朝鲜族,辽宁铁岭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罗蕙锡(1896—1948)与凌淑华(1900—1990)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韩国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第一代女性作家。她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但同处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疾苦之中。因此,特定的时代、民族生存环境和个人经历等构成了她们各自的社会文化语境,也决定了她们的创作特点。她们作为受过新教育的早期女性作家,其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和时代课题。李大钊说:“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彻底解放的时代、是女性彻底解放的时代、女性寻找自我的时代、男性发现女性价值的时代。”^[1]20世纪20年代,罗蕙锡和凌淑华在揭露封建思想和传统儒家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思考当时社会中女性地位,寻求解决女性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大胆实践。同时,她们还进一步思索女性受压迫的深层原因,以冷静、深邃的眼光去探寻答案。因此,这里的女性意识,主要意指女性关于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自我认识、女性的思想和价值观等初期女性主义的认识。

基于此,我们运用比较文学和女性主义(Feminism)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女性对爱情和婚姻自主的向往、女性追求独立的自我意识等方面,比较罗蕙锡和凌淑华小说的女性意识,同时考察两位作家的创作手法特征。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比较研究,考察当时韩中社会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和女性自身觉醒过程中的异同点,探究两国新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和创作特点,分析出20世纪20年代韩中两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其成因。此研究将对了解韩中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及特点,确定其在韩中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一、对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制度的批判

20世纪20年代,韩中两国正处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0世纪初期,在韩中两国同时展开的爱国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为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男权社会制度的桎梏、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女性自我意识

的觉醒,为知识女性——新女性认识和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和女性社会地位提供了社会文化气氛。数千年来,女性一直是男性的附属物,是为家族生产和维系家庭生活从事家务劳动的存在,她们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人格,往往是被分解的存在。重视男性特征的男权社会不仅是指支配女性,而且还内涵男性独占权利的社会关系。男性通常具有西式的、阳性、科学技术主义、生产、效率、个人中心主义、竞争等特征,而女性则追求东方式的、阴性、生态主义、再生产、参与、共同体、安定和均衡等。人们普遍认为的男性之性和女性之性不是自然的性,而是人们在社会中学习和被特定意识熏染下后天习得的性别概念。^[2]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1934—)在她的《性政治》中主张,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是力量的关系,所以性具有政治化倾向;男权思想夸大了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异,认为男性通常起着支配作用,而女性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解决女性问题就应先打破男权社会制度。^[2]女性主义理论家对男权社会中的性别概念产生原因及特征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并指出了女性摆脱压迫和剥削的根本办法,即打破男权社会制度。20世纪20年代,虽然女性依然深受男权社会制度的压迫,但她们开始觉醒,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这已成为韩中现代文学对于女性意识形态描写的视觉叙述模式,因为作家必须借助于性别压迫及觉醒的主题进行再创造,采用各种艺术手段对其进行艺术性诠释。

凌淑华的《女儿身世太凄凉》(1924年)中,主人公婉兰应父母之命嫁到婆家。婚后的生活使婉兰逐渐意识到:在没有任何保护女性人权的法律和意识的社会条件下,女人只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她觉得自己婚姻的不幸在于自己的无知和无能。^[3]婉兰通过自己的不幸遭遇和痛苦思索,逐渐认识到当时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男权社会制度,但她却没能奋起抗争,而是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中秋晚》(1925)中的敬仁太太也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寄托在外界事物上,认为自己是受动的,应服从于“天命”的被动存在。如果说敬仁太太是不幸的旧式女性的代表,那么她的婆婆便是男权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守护者,也是敬仁太太不幸的间接制造者,但她本人却全然意识不到。这一方面揭露了男权社会制度和思想对女性的毒害,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旧式女性的屈从和无意识,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罗蕙锡的《怨恨》(1926年)中的主人公李氏也

是从父亲的手中,交到丈夫手里,后又落到李参叛手中,她始终是男人的附属物,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存在。作者通过李氏的不幸婚姻和凄惨遭遇揭露和批判了男权社会制度的弊端和对女性人格的践踏与破坏,即父权的专制、把男人的风流不羁美化为男子汉之品德的暴力、只要求女性操守贞洁的专横、受到强暴的女性反被诬陷为道德败坏者的道德观念。《闺怨》(1921)中的李氏在丈夫早逝后,因为一个陌生男子的来访背负不守妇道之名被逐出家门。她的不幸是当时社会和家族制度造成的,但是主人公却意识不到,也没有任何反抗,只是逆来顺受,足见传统男权社会制度对女性思想的毒害和蹂躏程度。作者通过描绘传统女性的不幸人生,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宗法家族制度的对女性的迫害,同时,也督促女性自身的觉醒及自主独立意识的萌发。

凌淑华和罗蕙锡通过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和价值观影响下的被摧残、伤害、屈从、无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指出所谓命运实质上不外乎她们思想中因袭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凌淑华小说中的女性把不幸的原因归咎于她们没有遵守传统风俗和社会制度,罗蕙锡小说的主人公亦是如此。她们认为自己是隶属于男性的,是忍耐、顺从、柔弱的存在,自己的不幸是自己命运造成的,只能逆来顺受,但两位作家的小说中的人物却有差异。凌淑华小说中的人物虽顺应当时社会制度和传统思想,但可以看到处在社会变革中的传统女性的命运起伏和思想变化。而罗蕙锡作品中的人物却依然是传统女性,对自身的不幸遭遇还没有反省意识。凌淑华以善于调理丹青的细致笔触,通过人物间宁静、淡泊的对话表现出主人公对男权社会制度的洞察和批判,使人物性格跃然纸上;罗蕙锡的人物则主要依靠小说叙述者的叙述展现了旧式女性的不幸遭遇,使人物缺乏鲜活、动感的特征,显得人物性格更加被动。两位作家虽然都意在表现社会转型期女性人物的不幸,但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却有所不同,即主人公是否意识到造成自己不幸命运的社会原因。这种差异源于两个作家的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和启蒙主义作家的思想——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的差异。

二、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追求

经过开化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韩国和中国社会,20世纪20年代,有很多觉醒的年轻人力争从父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争取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其中女性追求对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自主

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也是罗蕙锡和凌淑华这时期小说表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女性意识内涵。

女性在男权社会遭受的灾难和压迫,很大程度上表现于在爱情和婚姻这一人生重大问题上没有自主权。她们对爱情和婚姻都抱有美好愿望,希望与自己喜欢的、喜欢自己的人相恋结婚并幸福生活。她们不仅要被选择,同时也要求自主选择。但现实却与她们的心愿相距甚远,残酷的现实并不考虑女性主体——她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愿,而是要遵循传统因袭决定她们的婚姻和人生。20世纪2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社会已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中国五四运动及韩国三一民族运动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唤醒民众意识,女性的觉醒当然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得以促进。^[4]

罗蕙锡和凌淑华作为韩国和中国现代第一代女性作家,自然对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女性问题进行文学诠释,试图就当时的女性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女性自身的觉醒。凌淑华《绣枕》(1925)中的大小姐,为了能够寻找到懂得欣赏自己才能的青年,在自己绣的一对绣枕里,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美好期盼。尽管她的方式保守且被动,但作为闺房中的小姐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竭尽全力。但绣枕的最终命运,却证明她的梦想遭到了男权社会的无情践踏,她的美好愿望和努力也随即化为了泡影。绣枕的命运是当时社会秩序中女性命运的隐喻和象征。《吃茶》(1925)中的芳影正当妙龄,却幽闺自怜,怅惘于难求异性知己。芳影擅长吟诗作对、写字、吹箫,与同学王淑贞及其哥哥王斌一同看电影、听音乐、去公园,被王斌的殷勤、体贴、文雅等深深吸引。后来当她知道王斌已有婚约,与自己无缘时,伤心失望至极。

“好笑得很,中国人吃饱了饭便想到婚嫁的事。……这不打紧,黄家忽然托人示意,叫哥哥去求婚。我哥哥很是好笑,不用说他已经在国外和张小姐订了婚,就是没有,他家哪里肯说一个跛小姐呢?但是过后皇家的人都说既然他不属意他家的小姐,为什么搀扶他,服侍她,那样卖小心呢?我哥哥知道了又是生气,又是好笑,他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芳影姐姐,你说好笑不好笑?”

芳影此时觉得有说不出的一种情绪,她嘴边微微显露一弧冷冷的笑容,……。她迟迟地说:“外国……规矩……”^[5]

通过王淑贞的一席话,芳影才知道了王斌的殷勤和体贴是他受外国式教育,学习外国礼仪的表现,芳影不过是受这种礼遇的女性之一。不知道外国习惯

和教育内容的芳影为王斌的外国礼仪赋予了特别的含义。结交王斌后,芳影的喜悦、心跳、期待表现了当时女性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憧憬和追求,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女性对西方现代教育的憧憬和认可。但是她们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太大差距,致使她们受到挫折和伤害。凌淑华通过描绘社会转型期女性的生活面貌、思想冲击和意识变化,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的教育问题和女性逐渐觉醒的过程。

中国如此,韩国也不例外。罗蕙锡在最早主张女权的文章《理想的妇人》(1914)中,就表现出了积极、开放、革命的思想。她尖锐地指出“贤妻良母”、“温良柔顺”的所谓传统妇德,不过是男权社会欲把女性奴化的手段。理想的女性应是具备知识和锐气,遇事有分辨的能力,在有意义的目标指导下,自觉发挥个性,使之成为具备现代思想、知识以及品性的新时代女性。换言之,恋爱至上主义、平等主义、幸福的家庭是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内容。二十多岁的罗蕙锡主张,女性也应具备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应有的责任、义务及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危险和失败的心理准备。

《庆熙》(1918)中的庆熙与罗蕙锡本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庆熙》被视为作家的自传小说。《庆熙》中,作为新女性的庆熙的苦闷和彷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即身为上层女性,如周围人所劝说的那样,是找一个如意郎君结婚生子,在丈夫和公婆的爱护下度过安逸幸福的生活呢?还是明知前途艰险,按照自己的信念,不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而是以与男人同等人格的女性生活?表面上看,罗蕙锡似乎毫无动摇地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她要摆脱安逸的生活对她的诱惑,洞察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克服对未来的不安情绪。这些问题不仅是因为她是时代的先驱,更是因为她是女性才更激烈。庆熙的决定也就是罗蕙锡自己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行为。

与凌淑华的作品相比较,罗蕙锡的作品因为作品中人物积极的性格特征,作品主题更加显明和突出。女大学生庆熙虽然勇敢地拒绝了父亲提议的婚事,但内心充满矛盾,更有胆怯。最后通过内心挣扎,确立女性主体性的结局,促进了社会公众对女性人格和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定位。这些特点,也使“庆熙”这一人物更加生动和鲜活。罗蕙锡在表达婚姻自主思想时,非常勇猛、直接、义无反顾。这与罗蕙锡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对男权社会及家庭制度的叛逆,亲身实践自己主张的勇敢行为,

通过作品中主人公性格进行了真实的文学反映。我们通过这一作品,可以了解 20 世纪 20 年代,韩国知识女性所要面对的社会及家庭的阻力和压力,她们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她们苦苦追寻的出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而,凌淑华在表现恋爱和婚姻自由主题上颇为委婉。这和她文静、内敛的性格有关。她以独具一格、细腻别致的笔触,深入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内心深处,反映当时女性的生活、思想和渴求。她的人物在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中,受到挫折和失败后,不是对社会和家庭进行积极反抗,而是默默地忍受,从而唤起读者的悲哀、同情和美好祝愿。但是罗蕙锡作品中的人物却因为她们勇敢地反抗和斗争,使读者产生欲鼓掌喝彩的冲动,更有对时代先驱者的敬意。这应该源于积极进取的主人公与消极保守的主人公的性格差异。

三、追求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

凌淑华与罗蕙锡不仅真实地书写了男权社会和家庭对女性的压迫,还深刻表现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有意识的新女性为了实现人格独立而进行的苦苦挣扎和不懈探索。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玛莉·沃斯頓克雷福特(Mar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在她的《女权拥护论》中,反对卢梭主张的男性和女性应接受不同教育——女性应接受忍耐、顺从、愉悦、温柔等品德教育;男性应接受勇气、节制、正义、不屈的精神等——的古典教育哲学的主张,把特权层女性称之为“羽毛装饰种族”,把中产层女性称之为“被监禁的女性”。他强调:女性为了实现真正的自我,应该接受与男性同样的教育。^[6]特别是民族、时代和社会环境处于巨变和动荡时期,作为新女性作家所感受到的冲击和使命感会更强烈。作家所特有的气质,使之很快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家所感受到的时代精神要比一般人更敏感更全面,彷徨和苦闷既是时代的特征,也是女性作家们价值观变化的具体体现。罗蕙锡的《母亲和女儿》(1937)中,英爱想继续读书,想成为一名作家,然后找一份工作与自己喜欢的人结婚,过一种具有独立人格、能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是,具有传统思想的母亲则希望英爱能与住在自己旅馆里的道政府青年职员韩云结婚,在丈夫的爱护和照料下,过安定幸福的生活。她认为:女人太优秀,就不会服从丈夫;男人过于优秀,就会让妻子操心。因此,她不想让女儿继续读书,只想让女儿尽早

找到自己的归宿。可以说,英爱母亲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也是新女性在传统观念和新价值观之间彷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她们知道追求新思想、新生活、新人格的道路虽然前途光明,但其过程充满坎坷和痛苦,然而要获得独立人格,这些痛苦是必须要承受的。这一点在《母亲和女儿》中,寄宿在自己家旅馆的新女性——金作家身上也得到了确认。金作家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被家庭所抛弃,在外面艰难孤独地生活和工作。尽管如此,她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和退缩,而是指导和帮助想要争取自立的女性,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防止走向极端或错误的道路。金作家可以说是新女性的代表,通过金作家的生活和工作,预示了英爱等新女性追求女性人格独立的可行性和伴随在她们前进道路上的艰辛。金作家是罗蕙锡离婚后,以病弱的身体寄宿在一家旅馆从事创作时的生活影射。

20 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为了获得彻底解放,在享有市民自由的同时,需要获得经济独立。他们主张,基于人人都应享有“自由”、“平等”的人本主义原则,女性也应该享有和男性同等的地位。他们认为,既有的女性与男性的能力差异是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7]基于此,女性应该有能力和有机会获得与男性接受同样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因为女性首先有了经济能力才能不依赖男性而独立生活,有了独立生活能力,才能有与男性平等对话和竞争的机会。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女性争取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机会尤显迫切和重要。凌淑华在《绮霞》中,刻画了在人格独立与爱情婚姻之间彷徨矛盾的现代女性,但她是一个最后走出家庭婚姻的樊篱,实现自己人格独立和价值的女性形象。以绮霞为代表的当时女性,只能在这两者之间痛苦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觉醒到让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和人格。他们只能让女性做出选择,要么在家庭中牺牲和奉献自己,要么在社会中孤独地苦苦挣扎。《绮霞》主人公最后的选择就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即获得人格独立的同时,失去婚姻和家庭。起初绮霞为了自己深爱的丈夫卓君与世隔绝,专心做贤妻良母,她得到的是家庭的安定,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远去。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去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时,她的丈夫和家庭便无法接受,将她逐出家门。这说明,女人只能为丈夫和家庭存在并要为之奉献,不然她便不能成为家庭成员,并被社会和家庭孤立和排挤。绮霞的坎坷和不幸真实

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男权社会和传统思想对女性人权的压迫和戕害,也反映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主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再见》(1925)中的筱秋拒绝了已发达成为督办官吏的昔日恋人骏仁的示爱,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女性取得的人格和经济独立,需要她们艰辛的守护。她们必须摆脱各种羁绊和诱惑,才能树立并坚守新时代女性的人格尊严和应有的权利,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得到社会的认可。绮霞和筱秋的这种决断,使她们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觉醒和飞跃,这种觉醒和飞跃是通过其付出的代价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实现的。英爱的读书欲望、绮霞的理想追求、筱秋独立意识预示着当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强烈的女性独立思想。

罗蕙锡在表现女性独立思想时,主要是通过传统思想和新思想的冲突,即母亲与女儿的思想差异和矛盾,通过作品中金作家这一人物的现实生活预示了其道路的艰难,给人一种悲壮的感觉。凌淑华则通过知识女性为了找回或坚守自我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对男权社会的专横和暴力予以无言的抨击和批判。但作品中却无一丝火药味,需读者在细细品味中去体会。这种意境和人物性格的差异,也是源自两个作家创作个性和创作手法的不同。

四、画家手笔的熟练运用和表现

凌淑华和罗蕙锡不仅是作家,而且也是画家。在她们作品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绘画技巧的灵活运用。凌淑华把绘画技巧和美学运用到了文学创作,把中国画余白美和美学写意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中国画的最高境界。

凌淑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豪门世家,她的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年进士,文学修养深厚且喜欢书画,官位至布政司,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约法会议议员。凌淑华从小开始接受书画教育并且表现出此方面的天赋,因此自幼跟随宫廷画师缪素筠学画,也曾师承齐白石和陈半丁。这些为她日后的绘画创作和在文学创作中绘画手法的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四运动时期,就读于天津直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凌淑华,以贵族家庭出身的新女性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就读燕京大学时学习了英语、日语、法语,选听了鲁迅的“新文学”课程。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时的一次欢迎宴上,她结识了陈西澄、徐志摩和胡适,后与陈西澄结为夫妻。与文坛顶尖作家的交流和学习,为凌淑华日后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倾向奠定了基础。

罗蕙锡涉足画坛却与凌淑华有着不同的过程。罗蕙锡出生于京畿道水原郡的一个名门望族,她的父亲曾任京畿道龙仁等地的郡守。罗蕙锡从小喜欢画画,因为开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1913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私立女子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在日本留学期间,才华横溢的罗蕙锡有幸与当时的文豪李光洙、廉想涉、文一平等交流,并受到当时自由主义、日本女性运动的影响,在日本组织“朝鲜女子亲睦会”,发行同仁誌《女子界》,发表有关女性解放的评论、小说、诗和散文。^[8]日本留学的经历和女性解放思想,为日后罗蕙锡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主题。

凌淑华的绘画手法,主要表现在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弱化和感情的节制,实现叙事结构和艺术形象的完美结合。比如《绣枕》,通过对两个场景,即大小姐忍着酷热一针一线绣枕的画面和大小姐伤心地望着两片被弄脏破坏的枕片伤心出神的画面,不加任何评价,以平淡语调叙述了大小姐的爱情和梦想受到挫折和破灭的过程。作品运用绘画的省略和余白美的手法,表现了“绣枕”所象征的意义。两个绣枕,一个被醉汉吐出的污物玷污,一个被赌博的人群践踏。这些超出原来的涵义,予以作品以更深层次、更多的隐喻。换言之,绣枕隐喻了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受到欺凌和践踏的女性的生存环境。《中秋晚》也有相似的结构。作品展示四个中秋节画面,描述了因敬仁夫妇封建懦弱的性格使一个家庭逐渐走向衰败的过程。此外,凌淑华还擅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手法,温和、冷静、客观地表现人物感情,收到含蓄美的艺术效果。凌淑华运用绘画手法,不仅是创作技巧,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她通过“写意”的手法,表现女性细腻的内心里世界,进而达到借物寄情的目的。凌淑华以冷静的笔调,描写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发生的日常生活悲剧,常以象征、比喻等手法,表现“言外之意”和“象外之旨”,不愧为“以画入文”的代表。

罗蕙锡则在自己的作品中,擅长运用光线和色彩进行环境和背景描写。

鸡鸣告诉人们新的一天来了。漆黑的夜晚变成了一片白色。东边纸窗的一边逐渐变亮,从蚊帐的一角开始也渐渐地被染成嫩绿色。^[7]

《庆熙》中,关于破晓的描写依次有黑色、白色、嫩绿色等对照鲜明的色彩。“从蚊帐的一角开始也渐渐被染成嫩绿色”的描绘很有新意。嫩绿色之所以有如此新鲜的感觉是因为与光线相伴,慢慢地把

蚊帐都染成嫩绿色的是光线,在这里只有嫩绿色被特写。“漆黑的夜晚变成了一片白色”也是同样的描写手法,即光线和色彩搭配在一起时的效果。这种关于光线与色彩的搭配描写在《闺怨》中也可以找到例证。罗蕙锡绘画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不仅在小说,而且在她的诗歌(《光》),散文(《四年前的日记中》、《三仙岩》)作品中也屡见不鲜。这是其绘画手法在其文学作品创作中的成功体现,同时也可以看到她身为画家的独特气质。

五、结语

罗蕙锡和凌淑华在小说创作的初期都关注当时社会中的女性问题,并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出了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新女性的女性意识。她们表现的女性意识中,不仅有对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制度的批判,也有对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向往,更有追求女性人格独立的自我意识。不过在描写人物性格和表现主题时,罗蕙锡从启蒙主义思想出发,以多种题材表现出对当时韩国社会女性问题的深刻认识,以比较直接、激进、义无反顾的态度予以表现。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她自己的实践履行了自己的主张,成为了韩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而凌淑华则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侧重表现资产阶级女性的遭遇,即她们的生活、病态和追求。在表现人物性格时,如她本人的性格温顺随和且简约凝练。作为对绘画艺术有相当深厚造诣的女性作家,在表达作品主题和思想时,罗蕙锡受西方印象派画风的影响,擅用光线

和色彩的结合进行环境和背景描写,使作品更具生动的美感;而凌淑华则擅用中国传统绘画的余白美学和写意手法,淡化故事情节,节制感情,实现故事和人物性格的完美统一。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源于作家对女性问题的高度关注,即两位作家比较富足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相似的社会背景、类似的经历,成为了她们共同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源于作家不同的经历和个性,即罗蕙锡的创作就像她所经历的人生一样,充满坎坷与曲折,却执着和不屈;凌淑华则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幽深、温婉地进行表达,充分显示出女性温柔的气质。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13.
- [2] [韩]金海玉.女性主义理论和韩国现代女性小说[M].首尔:博尔精出版社,2005.14,23.
- [3] 凌淑华古典作品[M].北京:当代世纪出版社,2003.112.
- [4] 韩国女性研究会.韩国女性史[M].汉城:草之光,1992.113.
- [5] 凌淑华.感悟名家经典小说——酒后[M].北京:京华出版社,2012.11.
- [6]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M]. [韩]李素英,译.汉城:韩信文化社,2000.16.
- [7] [韩]李相庆.庆熙外[M].坡州:凡宇社,2006.14,50.
- [8] 凡宇批评版韩国文学36—庆熙[M].坡州:凡宇社,2006.411.

[责任编辑:张振亭]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eminism in Rha Hye Suk's and Ling Shu Hua's Novels

PIAO Yin-shu, WEI Li-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fluential female writers and painters in Korea and China in 1920's, both Rha Hye Suk and Ling Shu hua showed strong feminism in their novels. They criticized the feudalism and male chauvinism, presented the pursuing of free love and women's self consciousness. Rha emphasized enlightened women's feminism awareness and women's social depression in Korea, while Ling described the twisted life of the women of capitalist class and their mordidity as well as the thirty for brightness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Moreover, readers can experience the skills such as the beauty of void space and freehand brushwork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n Ling's works, and the balanced light and colour in western painting in those of Rah's respectively. All this makes their novels full of exquisite refinement.

Key words: Rha Hye Suk; Ling Shu Hua; novel; feminist awareness; feminism; painting skill